

早年的新民晚报，在邻近外滩的北京东路圆明园路上。工余之暇我们无处可去，总是以外滩公园为我们的“后花园”，到那里溜达溜达；散散心；或是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黄浦江的风景。即使到了上海解放战争打响的前夕，也没有改变这样的习惯。

1949年4月12日前后上海远郊已经传来隐隐约约的大炮声，如同春雷滚动，惊起候鸟。老百姓都在悄声欢呼：“天亮快了，毛先生来了。”这些日子，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已经打完，解放军4月14日渡江，23日南京解放。上海南面的杭州，二十天前就解放了，上海人盼啊盼啊，“如大旱之望云霓”，踮酸了脚趾头。

常到外滩公园长椅上谈话的是记者之一吴让能。我们合得来，有些体己话，在公园里可以敞开心怀讲。他是报社女老板邓季惺先生的侄子，原在复旦大学读新闻系，因为参加学生运动，退学进了报社。我们生怕公园长椅的谈话引起旁人怀疑，往往以记者摄影为掩护，遮蔽人耳目。

我们那一年都只有二十五六，目空一切，喜欢“指点江山”纵论天下大势。现在回想起来，还真觉得可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知识分子多嘴，还自作多情。那时候我们就深怀杞忧，怕共产党管不好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怕进了上海这个“大染缸”会变色，怕暗藏的坏人捣乱破坏；怕糖衣炮弹、美女蛇、薄刀党荆棘满地，上海这个码头难打啊……

解放迄今，六十多个年头过去了。其间虽然弯路走了不少，还好，杞国的天没有倾覆，没有塌下；有共产党的长人顶住呢。

吴让能警敏、活泼、热情、豪爽，他在上海解放时期确实做了不少工作：除了做记者本职的采访写稿，还在报社团结职工，扩厂，组织青年学习时事、政策，偷听新华广播，还参加上海学联和新闻出版界的地下斗争。他和社会上有广泛联系，常常带一些进步分子参加报社的舞会、扭秧歌、联欢会，十分活跃。自然，其间也有失误。有些事情是客观原因，甚至是人为因素造成的，错不一定在他，而在组织。1952年他被调往黄浦区委宣传部工作。1957年又为胡风鸣不平而“错划”，下放浦东农村劳教。摘帽后到黄浦区一所小学教书，当“弼马温”十多年。粉碎“四人帮”后他恢复党籍，但恢复不了新闻工作，而是转入政法部门，在区检察院做党务工作。离休后社会生活还是不少，谈笑风生，豪情不减当年，八九十的老头，不显得老。

试举一桩小事为例：是五年前了，2009年8月17日，吴让能在电话里邀我去拍一部电视纪录片，片名叫《1949：接管大上海》。视频将以我们六十五年之前坐在外滩公园长椅上谈话的一个镜头作为片头。我说，“不，不，不可以。接管大上海这样的历史事件，怎么能以我们做纪录片片头？接管大上海的是解放军，是陈毅、粟裕、潘汉年他们，可不是我们。”

摄制组的人解释：这个纪录片是以拍一般的平民百姓活动为主，亲身经历者都是老年人，不是“官式”的革命文献纪录片。次日一早，天没有大亮就到了“外景地”东方明珠塔下的滨江大道，我们二人先在导演和摄像师指点下到镜头前推演了两遍，就进入戏中。

面对隔江的外滩景物，我确实有些触景生情。回首当年旧事，感慨系之。时间过得真快，它一如黄浦江的波涛，正在我们眼前滚滚奔流而去。逝者如斯夫，我们原来都这么老了！

纪录片的这组镜头，是导演受到我们当年一张老照片的启发。照片只有一寸大小，早已泛黄褪色，人影模糊。我用浆糊粘在照相簿上，临近上海解放的日子，坐在外滩公园的长椅上“指点江山”的情景，我们想象未来，憧憬梦境似的新生活，就要到来的社会主义新社会，那一定是充满光明的、民主富强、自由平等的文明国家。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恐怖，也没有战争。我们中国人渴望一百多年的好光景就要降临了。

纪录片的一组镜头大约只花了半个小时就摄制完成，我们的角色上台不过几分钟。

至于上文所说的《1949：接管大上海》纪录片，原是市委党史研究室和SMG电视新闻中心合摄的建国60周年的“文化盛宴”的一部分：六部纪录片系列中的一个开篇。受访者的对象，平均年龄84岁。当年9月28日和10月1日先后在新闻综合频道和纪实频道播出。视频首先出现了那张历尽沧桑的外滩公园长椅，好像青埂峰，那块石头，那上面留下多少上海的悲欢离合记忆。



上海是开中国女子教育先河的重要城市。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上海这座城市的近代化进程。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偏见根深蒂固，妇女没有权力享受学校教育。上海开埠后，这一现象开始改变。1850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感慨于中国妇女教育程度之低，在上海创立裨文女塾。这是上海第一所女子学校，标志着基督教在上海开办女子学校教育的开始。次年，美国传教士琼司女士在虹口创办文纪女塾。其后，上海的教会女子学校纷纷创办。至19世纪末，上海教会女子学校已有10余所，约占全国教会女子学校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比较知名的有，创办于1861年的清心女子中学、创办于1881年的圣玛利亚女中、创办于1892年的中西女子中学、创办于1897年的晏摩氏女中等。基督教在上海创办女校的初衷是传教、发展教徒，其本质是一种文化侵略，但客观上却起到了改变中国社会观念，促进上海近代女子教育发展和妇女解放的积极作用。

基督教女校在上海的创办，刺激了国人自己开办女校的热情，同时也为上海士绅和进步人士自办女校提供了模本。在梁启超、经元善等人的倡议和筹办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子学校上海女学堂（又称经正女学）于1898年成立。其后，务本女塾、爱国女学、城东女学社、宗孟女学堂

等华人女校纷纷创办。

1906年被视为上海华人女学成立之大年。这一年里，相继有民立女中学堂、三育女学堂、祝群女校、萃秀女学堂、辅强女学堂、南

州女校、润鸿女学堂等8所女子学校成立。至1920年代初期，上海已有40余所华人私立女校，呈现华人女校与教会女校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之势。

辛亥革命的爆发，上海女子教育进入新的发展期。许多女校在小学基础上发展出中学部，部分教会女校还开设了高等教育。随着女校学制的逐步完善，上海的华人大学与教会大学相继向女学生放开入学限制，使得女子开始享受高等教育。同时，平民女校也逐步创建。李达于1921年开办的平民女校特邀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等出任学校教员，为学生作专题讲座，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女学生发展自身、走向社会。

至上世纪30、40年代前后，上海女子教育呈多样化发展趋势。上海不仅女子基础教育位居全国之首，而且还出现了国人自办的女子大学。同时，女子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与全国其他城市女子职业学校相比，上海女子职业教育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并非是蚕桑、纺织、缝纫、刺绣、家事、助产等传统专业，而是女子职业教育的新兴学科——商科。1935年，周振韶在上海创设上海妇女教育馆。这个类似女子教育俱乐部的机构既帮助女性提高文化水平，也有与女子职业教育衔接

等华人女校纷纷创办。

1906年被视为上海华人女学成立之大年。这一年里，相继有民立女中学堂、三育女学堂、祝群女校、萃秀女学堂、辅强女学堂、南

州女校、润鸿女学堂等8所女子学校成立。至1920年代初期，上海已有40余所华人私立女校，呈现华人女校与教会女校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之势。

辛亥革命的爆发，上海女子教育进入新的发展期。许多女校在小学基础上发展出中学部，部分教会女校还开设了高等教育。随着女校学制的逐步完善，上海的华人大学与教会大学相继向女学生放开入学限制，使得女子开始享受高等教育。同时，平民女校也逐步创建。李达于1921年开办的平民女校特邀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等出任学校教员，为学生作专题讲座，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女学生发展自身、走向社会。

至上世纪30、40年代前后，上海女子教育呈多样化发展趋势。上海不仅女子基础教育位居全国之首，而且还出现了国人自办的女子大学。同时，女子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与全国其他城市女子职业学校相比，上海女子职业教育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并非是蚕桑、纺织、缝纫、刺绣、家事、助产等传统专业，而是女子职业教育的新兴学科——商科。1935年，周振韶在上海创设上海妇女教育馆。这个类似女子教育俱乐部的机构既帮助女性提高文化水平，也有与女子职业教育衔接

等华人女校纷纷创办。

1906年被视为上海华人女学成立之大年。这一年里，相继有民立女中学堂、三育女学堂、祝群女校、萃秀女学堂、辅强女学堂、南

州女校、润鸿女学堂等8所女子学校成立。至1920年代初期，上海已有40余所华人私立女校，呈现华人女校与教会女校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之势。

辛亥革命的爆发，上海女子教育进入新的发展期。许多女校在小学基础上发展出中学部，部分教会女校还开设了高等教育。随着女校学制的逐步完善，上海的华人大学与教会大学相继向女学生放开入学限制，使得女子开始享受高等教育。同时，平民女校也逐步创建。李达于1921年开办的平民女校特邀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等出任学校教员，为学生作专题讲座，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女学生发展自身、走向社会。

至上世纪30、40年代前后，上海女子教育呈多样化发展趋势。上海不仅女子基础教育位居全国之首，而且还出现了国人自办的女子大学。同时，女子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与全国其他城市女子职业学校相比，上海女子职业教育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并非是蚕桑、纺织、缝纫、刺绣、家事、助产等传统专业，而是女子职业教育的新兴学科——商科。1935年，周振韶在上海创设上海妇女教育馆。这个类似女子教育俱乐部的机构既帮助女性提高文化水平，也有与女子职业教育衔接

等华人女校纷纷创办。1906年被视为上海华人女学成立之大年。这一年里，相继有民立女中学堂、三育女学堂、祝群女校、萃秀女学堂、辅强女学堂、南

州女校、润鸿女学堂等8所女子学校成立。至1920年代初期，上海已有40余所华人私立女校，呈现华人女校与教会女校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之势。

辛亥革命的爆发，上海女子教育进入新的发展期。许多女校在小学基础上发展出中学部，部分教会女校还开设了高等教育。随着女校学制的逐步完善，上海的华人大学与教会大学相继向女学生放开入学限制，使得女子开始享受高等教育。同时，平民女校也逐步创建。李达于1921年开办的平民女校特邀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等出任学校教员，为学生作专题讲座，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女学生发展自身、走向社会。

至上世纪30、40年代前后，上海女子教育呈多样化发展趋势。上海不仅女子基础教育位居全国之首，而且还出现了国人自办的女子大学。同时，女子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与全国其他城市女子职业学校相比，上海女子职业教育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并非是蚕桑、纺织、缝纫、刺绣、家事、助产等传统专业，而是女子职业教育的新兴学科——商科。1935年，周振韶在上海创设上海妇女教育馆。这个类似女子教育俱乐部的机构既帮助女性提高文化水平，也有与女子职业教育衔接

等华人女校纷纷创办。

1906年被视为上海华人女学成立之大年。这一年里，相继有民立女中学堂、三育女学堂、祝群女校、萃秀女学堂、辅强女学堂、南

州女校、润鸿女学堂等8所女子学校成立。至1920年代初期，上海已有40余所华人私立女校，呈现华人女校与教会女校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之势。

辛亥革命的爆发，上海女子教育进入新的发展期。许多女校在小学基础上发展出中学部，部分教会女校还开设了高等教育。随着女校学制的逐步完善，上海的华人大学与教会大学相继向女学生放开入学限制，使得女子开始享受高等教育。同时，平民女校也逐步创建。李达于1921年开办的平民女校特邀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等出任学校教员，为学生作专题讲座，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女学生发展自身、走向社会。

至上世纪30、40年代前后，上海女子教育呈多样化发展趋势。上海不仅女子基础教育位居全国之首，而且还出现了国人自办的女子大学。同时，女子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与全国其他城市女子职业学校相比，上海女子职业教育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并非是蚕桑、纺织、缝纫、刺绣、家事、助产等传统专业，而是女子职业教育的新兴学科——商科。1935年，周振韶在上海创设上海妇女教育馆。这个类似女子教育俱乐部的机构既帮助女性提高文化水平，也有与女子职业教育衔接

等华人女校纷纷创办。

1906年被视为上海华人女学成立之大年。这一年里，相继有民立女中学堂、三育女学堂、祝群女校、萃秀女学堂、辅强女学堂、南

州女校、润鸿女学堂等8所女子学校成立。至1920年代初期，上海已有40余所华人私立女校，呈现华人女校与教会女校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之势。

辛亥革命的爆发，上海女子教育进入新的发展期。许多女校在小学基础上发展出中学部，部分教会女校还开设了高等教育。随着女校学制的逐步完善，上海的华人大学与教会大学相继向女学生放开入学限制，使得女子开始享受高等教育。同时，平民女校也逐步创建。李达于1921年开办的平民女校特邀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等出任学校教员，为学生作专题讲座，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女学生发展自身、走向社会。

至上世纪30、40年代前后，上海女子教育呈多样化发展趋势。上海不仅女子基础教育位居全国之首，而且还出现了国人自办的女子大学。同时，女子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与全国其他城市女子职业学校相比，上海女子职业教育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并非是蚕桑、纺织、缝纫、刺绣、家事、助产等传统专业，而是女子职业教育的新兴学科——商科。1935年，周振韶在上海创设上海妇女教育馆。这个类似女子教育俱乐部的机构既帮助女性提高文化水平，也有与女子职业教育衔接

等华人女校纷纷创办。

1906年被视为上海华人女学成立之大年。这一年里，相继有民立女中学堂、三育女学堂、祝群女校、萃秀女学堂、辅强女学堂、南

州女校、润鸿女学堂等8所女子学校成立。至1920年代初期，上海已有40余所华人私立女校，呈现华人女校与教会女校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之势。

辛亥革命的爆发，上海女子教育进入新的发展期。许多女校在小学基础上发展出中学部，部分教会女校还开设了高等教育。随着女校学制的逐步完善，上海的华人大学与教会大学相继向女学生放开入学限制，使得女子开始享受高等教育。同时，平民女校也逐步创建。李达于1921年开办的平民女校特邀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等出任学校教员，为学生作专题讲座，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女学生发展自身、走向社会。

至上世纪30、40年代前后，上海女子教育呈多样化发展趋势。上海不仅女子基础教育位居全国之首，而且还出现了国人自办的女子大学。同时，女子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与全国其他城市女子职业学校相比，上海女子职业教育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并非是蚕桑、纺织、缝纫、刺绣、家事、助产等传统专业，而是女子职业教育的新兴学科——商科。1935年，周振韶在上海创设上海妇女教育馆。这个类似女子教育俱乐部的机构既帮助女性提高文化水平，也有与女子职业教育衔接

等华人女校纷纷创办。

1906年被视为上海华人女学成立之大年。这一年里，相继有民立女中学堂、三育女学堂、祝群女校、萃秀女学堂、辅强女学堂、南

州女校、润鸿女学堂等8所女子学校成立。至1920年代初期，上海已有40余所华人私立女校，呈现华人女校与教会女校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之势。

辛亥革命的爆发，上海女子教育进入新的发展期。许多女校在小学基础上发展出中学部，部分教会女校还开设了高等教育。随着女校学制的逐步完善，上海的华人大学与教会大学相继向女学生放开入学限制，使得女子开始享受高等教育。同时，平民女校也逐步创建。李达于1921年开办的平民女校特邀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等出任学校教员，为学生作专题讲座，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女学生发展自身、走向社会。

至上世纪30、40年代前后，上海女子教育呈多样化发展趋势。上海不仅女子基础教育位居全国之首，而且还出现了国人自办的女子大学。同时，女子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与全国其他城市女子职业学校相比，上海女子职业教育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并非是蚕桑、纺织、缝纫、刺绣、家事、助产等传统专业，而是女子职业教育的新兴学科——商科。1935年，周振韶在上海创设上海妇女教育馆。这个类似女子教育俱乐部的机构既帮助女性提高文化水平，也有与女子职业教育衔接

等华人女校纷纷创办。

1906年被视为上海华人女学成立之大年。这一年里，相继有民立女中学堂、三育女学堂、祝群女校、萃秀女学堂、辅强女学堂、南

州女校、润鸿女学堂等8所女子学校成立。至1920年代初期，上海已有40余所华人私立女校，呈现华人女校与教会女校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之势。

辛亥革命的爆发，上海女子教育进入新的发展期。许多女校在小学基础上发展出中学部，部分教会女校还开设了高等教育。随着女校学制的逐步完善，上海的华人大学与教会大学相继向女学生放开入学限制，使得女子开始享受高等教育。同时，平民女校也逐步创建。李达于1921年开办的平民女校特邀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等出任学校教员，为学生作专题讲座，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女学生发展自身、走向社会。

至上世纪30、40年代前后，上海女子教育呈多样化发展趋势。上海不仅女子基础教育位居全国之首，而且还出现了国人自办的女子大学。同时，女子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与全国其他城市女子职业学校相比，上海女子职业教育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并非是蚕桑、纺织、缝纫、刺绣、家事、助产等传统专业，而是女子职业教育的新兴学科——商科。1935年，周振韶在上海创设上海妇女教育馆。这个类似女子教育俱乐部的机构既帮助女性提高文化水平，也有与女子职业教育衔接

等华人女校纷纷创办。

1906年被视为上海华人女学成立之大年。这一年里，相继有民立女中学堂、三育女学堂、祝群女校、萃秀女学堂、辅强女学堂、南

州女校、润鸿女学堂等8所女子学校成立。至1920年代初期，上海已有40余所华人私立女校，呈现华人女校与教会女校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之势。

辛亥革命的爆发，上海女子教育进入新的发展期。许多女校在小学基础上发展出中学部，部分教会女校还开设了高等教育。随着女校学制的逐步完善，上海的华人大学与教会大学相继向女学生放开入学限制，使得女子开始享受高等教育。同时，平民女校也逐步创建。李达于1921年开办的平民女校特邀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等出任学校教员，为学生作专题讲座，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女学生发展自身、走向社会。

至上世纪30、40年代前后，上海女子教育呈多样化发展趋势。上海不仅女子基础教育位居全国之首，而且还出现了国人自办的女子大学。同时，女子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与全国其他城市女子职业学校相比，上海女子职业教育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并非是蚕桑、纺织、缝纫、刺绣、家事、助产等传统专业，而是女子职业教育的新兴学科——商科。1935年，周振韶在上海创设上海妇女教育馆。这个类似女子教育俱乐部的机构既帮助女性提高文化水平，也有与女子职业教育衔接

等华人女校纷纷创办。

1906年被视为上海华人女学成立之大年。这一年里，相继有民立女中学堂、三育女学堂、祝群女校、萃秀女学堂、辅强女学堂、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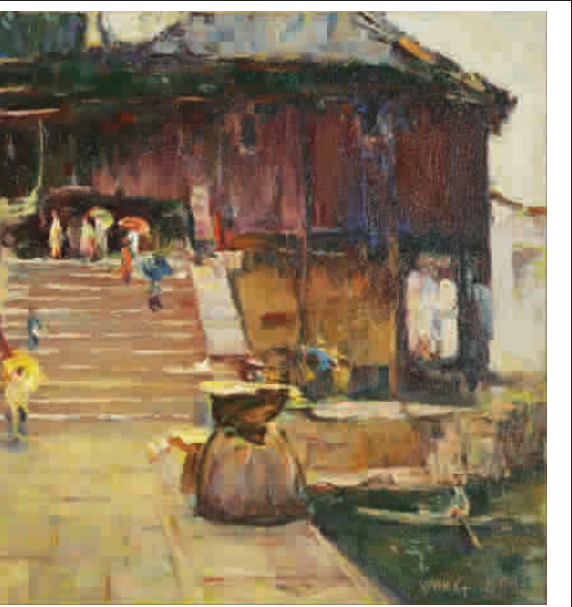
州女校、润鸿女学堂等8所女子学校成立。至1920年代初期，上海已有40余所华人私立女校，呈现华人女校与教会女校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之势。

辛亥革命的爆发，上海女子教育进入新的发展期。许多女校在小学基础上发展出中学部，部分教会女校还开设了高等教育。随着女校学制的逐步完善，上海的华人大学与教会大学相继向女学生放开入学限制，使得女子开始享受高等教育。同时，平民女校也逐步创建。李达于1921年开办的平民女校特邀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等出任学校教员，为学生作专题讲座，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女学生发展自身、走向社会。

至上世纪30、40年代前后，上海女子教育呈多样化发展趋势。上海不仅女子基础教育位居全国之首，而且还出现了国人自办的女子大学。同时，女子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与全国其他城市女子职业学校相比，上海女子职业教育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并非是蚕桑、纺织、缝纫、刺绣、家事、助产等传统专业，而是女子职业教育的新兴学科——商科。1935年，周振韶在上海创设上海妇女教育馆。这个类似女子教育俱乐部的机构既帮助女性提高文化水平，也有与女子职业教育衔接

等华人女校纷纷创办。

1906年被视为上海华人女学成立之大年。这一年里，相继有民立女中学堂、三育女学堂、祝群女校、萃秀女学堂、辅强女学堂、南



水边 (油画) 方世聪

我爱吃京菜。大家一定听过相声《报菜名》里那个段子，那段子里报的菜名就是京菜的菜名。这些菜我爱吃。

我最早吃京菜的地方是当时在四马路（福州路）近福建路口的会宾楼。那时候的儿童书局（今古籍书店）就在它对面。我常去儿童书局，有时遇到朋友，就一起上会宾楼吃饭去。会宾楼是家大饭店，但平民化。我已经好多日子不吃京菜了，还记得当时在那里

爱吃又经常吃的几个菜：溜黄菜（其实是溜鸡蛋）、烧四宝、爆三样，现在十分普通的酸辣

汤，其实也是京菜。相声《报菜名》里的那些菜会宾楼都有。特别是代替米饭的银丝卷，非京菜餐馆更是吃不到的。

离会宾楼不远，湖北路上还有一家悦宾楼，也是京菜馆，我也去吃过。不过我还是常去会宾楼，因为熟了。进这两家京菜馆，就像进北京的饭庄，那气氛是一股北京味儿。我到过北京的萃华楼等饭庄，觉得它们气氛的京味儿还没有会宾楼悦宾楼那么足呢。

解放后会宾楼悦宾楼都没有了，我又换了个地方吃京菜，就是国际饭店二楼的丰泽园。它的气派就大多了，我常遇到一些京戏票友。有一次隔壁一桌人高谈阔论，原来是俞振飞大师的学生，他们说有事求俞大师的话，不去找俞大师而是去找俞师母。当时的俞师母应是原先的俞师母，而不是后来的言慧珠。记得在丰泽园我吃到一个新的京菜，叫“李家鱼”，它虽是蒸出来的，却不同于我们广东菜的蒸鱼，调味复杂得多。不知道这丰泽园今天是不是还存在。

再后来，南京路上粤菜馆南华酒家改为燕云楼，供应京菜，我也去过，不过进去没有什么北京气氛了，菜倒是京菜。如今燕云楼挪了地方，还开着。

听说京菜源于鲁菜，可能不假，反正不但京菜，还有北方各地的菜都和我们江南苏锡菜不同，更不要说同我们广东菜完全两样了。我过去也到永安公司后面九江路上的天津馆子吃饭，那里也是北方气氛和北方菜味道。服务员在楼上又对厨房吆喝顾客点的菜名，又在楼梯口吆喝账目，用的是北方话，北方话在过去的上海还是很少听到的。而他们的菜如爆三样等也是京菜味儿，就是许多京菜它没有，如溜黄菜、烧四宝等就没有。像这样的北方菜饭馆还有八仙桥那里的青梅居等。

我什么菜都爱吃，我爱吃京菜，也爱吃北方菜。

我什么菜都爱吃，我爱吃京菜，也爱吃北方菜。

我什么菜都爱吃，我爱吃京菜，也爱吃北方菜。

我什么菜都爱吃，我爱吃京菜，也爱吃北方菜。

我什么菜都爱吃，我爱吃京菜，也爱吃北方菜。

我什么菜都爱吃，我爱吃京菜，也爱吃北方菜。

我什么菜都爱吃，我爱吃京菜，也爱吃北方菜。

我什么菜都爱吃，我爱吃京菜，也爱吃北方菜。

我什么菜都爱吃，我爱吃京菜，也爱吃北方菜。

我什么菜都爱吃，我爱吃京菜，也爱吃北方菜。

我什么菜都爱吃，我爱吃京菜，也爱吃北方菜。

我什么菜都爱吃，我爱吃京菜，也爱吃北方菜。

我什么菜都爱吃，我爱吃京菜，也爱吃北方菜。

我什么菜都爱吃，我爱吃京菜，也爱吃北方菜。

我什么菜都爱吃，我爱吃京菜，也爱吃北方菜。

我什么菜都爱吃，我爱吃京菜，也爱吃北方菜。

我什么菜都爱吃，我爱吃京菜，也爱吃北方菜。

我什么菜都爱吃，我爱吃京菜，也爱吃北方菜。

我什么菜都爱吃，我爱吃京菜，也爱吃北方菜。

我什么菜都爱吃，我爱吃京菜，也爱吃北方菜。